

中国体育的
风风雨雨

石航波 编

中国体育的风风雨雨

石航波 编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一 丁

封面设计：牛 涛

中国体育的风风雨雨

石 航 波 编

*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二号)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排版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20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81002-155-9/G · 156

定 价：2.95元

内 容 提 要

洛杉矶奥运会曾使我们欣喜若狂，汉城奥运会却使我们震惊不已。这种强烈的反差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疑问、担心和焦虑。本书以翔实的笔法，以全景式的视角，透视剖析了我国体育战线的状况，生动真实地向读者回答了中国的体育明星为什么失去了昔日的灿烂光芒，他们的心灵究竟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历程，同时，还向读者揭露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体育内幕。

序

王 圻

我的许多朋友都是体育迷，其“迷”的兴趣和程度绝不亚于逛香山、昆明湖荡舟。但是，这些朋友们对于投身于某一项目的锻炼，诸如打打网球，踢踢足球什么的，全无兴趣。其“迷”，只是在嘴上，特别是近几年来，饭后茶余，凑在一块堆儿“吹”的都是体育上的事儿，说到激动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争吵也算是体育锻炼的话，这些朋友们够得上健将级运动员了。

这些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即不喜欢咱们的运动员输。一说起什么大赛中咱们的运动员输了，其愤愤然在表情上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气不打一处来的劲头儿，倘若让某一个运动员见了，非把人家气晕了不可。

这种心态正常吗？说到底它反映出我们民族对体育的一种什么样的理解。换句话说，在输与赢的问题上，咱们中国人应该怎样保持一个科学的理智加冷静的头脑。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的体育健儿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辉煌的，那激动人心的升旗场面，曾使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自豪得昂头挺胸。但是，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只能赢，不能输，对运动员的要求越来越高。殊不知，我们自己在关心输赢的同时，多多少少把奥林匹克精神置之脑后了。正是我们自己按照自己对体育的

理解，把许多本不由体育承担的东西加给了体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体育的理解还是浮浅的，这是事实。

当然，谁都不喜欢输，正如士兵不愿打败仗一样，这是十分自然的，它从一个侧面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人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因此，希望我们的全体国人热心于体育锻炼（虽然我们的国家眼下还不那么富强），我们应当看到这是时代对我们的一个热情呼唤，或许由此我们才可以避免举国上下亿万群众为一个朱建华雀跃欢呼的尴尬局面。

本书的编者也是一个喜欢赢而不喜欢输的人，但她的头脑较为清醒，她曾坦率地对我讲：“我想让人们理解运动员的难处，但我更希望运动员理解亿万群众的心情。”看来，她是信奉“理解万岁”的。我想，“理解万岁”的态度是可取的，恐怕这也正是本书编者编此书的初衷。

1989年7月20日于东四

目 录

序	王 妍 (1)
中国体坛内幕的深层曝光	戚 鸣 田玉豹 (1)
汉城反思录	金 汕 (36)
“李宁失态”的背后	毕 铭 (101)
何智丽奥运会落选的内幕	陆 黛 (107)
女排兵败事出有因	蓝 阳 (129)
大悲大喜的备忘录	尹卫星 (142)

触目惊心 发人深省

中国体坛内幕的深层曝光

戚 鸣 田玉豹

可怕的惶惑

座落在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象祖国的一扇大门，又迎来了欢迎运动员归国的一天。作为一个运动员的亲属，一年不知要光顾这里多少次。出国比赛，运动员有输有赢，有喜有悲。然而，最初的问候、最初的安慰，都会在他们心头滚过，似水般的柔情。所以，亲人们也就倍加珍视这一次次的等候。

离飞机着陆还有半个小时，赵蕾怀抱一岁的女儿，急匆匆奔入首都机场接待大厅的侧门。岂不料，在入口处，她被门卫拦截：

“干什么去？”门卫毫不客气地问。

“接运动员！”

赵蕾好生奇怪。谁不知道今天是赴汉城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归国的日子。更何况，恐怕不少领导，这时已在接待大厅里等候了。

“屁运动员，打得那么臭。”

门卫一腔怒气地把她们母女推向旅客大厅。

走在熙熙攘攘的旅客大厅里，赵蕾冲着四处张望，好奇

地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苦笑了一下。她没有向那个粗犷的门卫分辨什么，也没有向他嚷：我是许海峰的妻子，我丈夫曾经为祖国捧回过第一块奥运金牌，今非昔比，许海峰这次只得到一块铜牌。赵蕾有她的自知之明。

其实，汉城奥运会后，遇到这种难堪窘况的，又何止赵蕾一人？一天傍晚，女排教练李耀先，被四个彪形大汉迎面堵在路上。

“你就是李耀先？”四个人中的一个问。

李耀先不免警觉地回答：“是，……有事吗？”

“瞧你那熊相，一看就象吃零蛋的。”

李耀先被冷不丁骂了个狗血喷头。

另一位从提包中取出几条领带，递到李耀先面前，说：“看，我们早已为你准备好了方便的家伙，赶紧找个地方上吊算了！”

看着这几条领带，李耀先无言以对……。

当门卫对着赵蕾骂运动员时，当青年们向李耀先掏出上吊用的家伙时，我们是批评他们的蛮横无理呢？还是称道他们的民族情感呢？

当然，国人的冷眼是因为在汉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仅得了5枚金牌，人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似乎比起洛杉矶奥运会，15次令人扬眉吐气的升国旗、奏国歌来，这些不争气的“小畜牲”辱没了列祖列宗！

其实，真正最先感受到这种痛苦的，莫过于运动员自己。

中国唯一的奥运会女子体操冠军马燕红，在回忆洛杉矶奥运会夺体操高低杠金牌时，曾有这样一段话：那时，我肚子疼得怎么也站不起来。后来听说陈永妍成绩不好，吴佳妮

又摔伤了，全队仅我一个人有希望争冠军时，我站了起来。我艰难地走到入口处，只听到身后男女队员都小声地喊：

“小马，加油啊！”霎时间，我感到身后立起一座坚实的长城。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放心吧，我拼了！

那时候，运动员把十亿中国人作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喻为长城。这堵墙凭添了他们的自豪感。然而，在汉城奥运会上，当射击运动员张秋萍只身一人挤进赛场，看到苏联运动员的教练为队员背枪提袋时，她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她感到身后的那堵墙倒塌了；当中国女排输给秘鲁女排，袁伟民去做思想动员，以十亿人民的重托鼓励女排再次拼搏时，她们摇头。她们不仅没增添信心，反而感到这堵墙的沉重；当游泳运动员庄泳获得100米自由泳银牌，与民主德国运动奥托分别站在领奖台上时，她怎么也不能挺起自豪的胸膛，她始终感到奥托似有神助，自己赶不上她……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这种心态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情绪？

——民族精神的危机！？

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

运动员心中的长城倒塌了。

一个封闭的圆，也许没有外在力，它永远只是按照自己的轨迹，年复一日地绕行。然而，国门打开，一个圆从各个侧面都被外来的力量切入，旧有的一切，一下子变得那样陈旧、老化，在切入这个轨道的外力强刺激撞击中，旧有的一切奉为光荣、神圣的东西，似乎都裂为碎片。

中国体育就是面临着这样的撞击！

或许人们还不愿相信。然而事实上，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没有什么比金钱的切入，更具有对人心的撞击力了。

许海峰是实现中国奥运史上零的突破的历史性人物。原来，他仅仅是安徽巢湖供销社卖化肥的营业员。恐怕外国人怎么也不会相信，他获得冠军时的心情，竟是为“终于能有一份固定职业而轻松”。一个倒霉的小伙子，爱枪如命。可是想当兵，超过入伍年龄四个月。想进射击队，又因年龄的杠杠，给杠在场外。只得终日扛化肥，挣那35块大洋。唯一的娱乐，是扛着猎枪空瞄山包上的土疙瘩。25岁，许海峰在家乡小镇上有了一个女朋友，一位温和娴静女孩子，俩人一见倾心，情意缠绵。哪曾想，姑娘的父母却因许海峰是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太低，而不同意他们的姻缘。姑娘与许海峰分手时哭着说：“想你打枪还能打出点名堂来，你就努把力，上外边打枪去吧，弄好了，也能进个全民单位”。

如今，许海峰终于打出名堂来了，而且打到洛杉矶奥运会上去了。普拉多的枪声，使他成为中国奥运金牌第一得主，说起来，那直接的动力，仅仅是为了能弄成一个全民单位，有一份商品粮。这就是中国运动员的起步——令人酸楚的原动力。一个来自小镇的售货员，面对着奥运会6000元的金牌奖金，他不知道如何去花销。

马燕红，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亲月工资50元，母亲49元。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地用这微薄工资度日，月初就把钱存进银行。马燕红往往为了吃根糖葫芦，也要爸爸到银行去“借钱”来。小时候，妈妈每次接女儿从幼儿园回家路过商店，女儿总爱盯着那辆小三轮骑车不肯走。同院的小朋友有一辆，红红的坐垫，亮晶晶的镀铬扶把，太馋人了！可小朋友不肯给马燕红骑。马燕红闹着要妈妈买，妈妈没有钱，总是买小皮球来胡弄她。她哭她闹，抱着妈妈的腿不肯走，但妈妈就是不给买。以后，妈妈宁肯绕道多走些

路，也不再去穿那个商店了。

第一次去美国参加比赛，马燕红走进高级饭店，房间里有彩电、冰箱、空调，她惊呆了！象童话中的灰姑娘，意外地走进了宫殿，认定这是天下最舒服的地方。她激动得只会一再地喊：“高级，太高级了！”她走进饭店的游乐大厅，第一次玩上电子游戏，边玩边大吃摆在厅廊里供人随便享用的水果，香蕉大得使人不相信它是真的，苹果也象蜡做的。在这神话般的世界里，她第一次明显地感到一种悲凉。在她的童年里，只有高高飞起的秋千和样板戏。每个星期天，爸爸带她和姐姐进公园荡秋千。那时，她以为，这是童年生活最大的乐趣了。逢到过年过节，妈妈给她梳一条扎红头绳的独辫，然后为爸爸妈妈唱一段《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以为这就是童年生活中最得意的事情。如今看来，那多土，多单调啊！电子游戏机对马燕红心灵的撞击是那么强烈，以至后来她退役，便决定去那“高级”的世界，并不惜为此几经周折，最后以脱掉军装放弃一切为代价，去奔向那“极乐世界”。

李小平、文佳、李月久、吴佳妮、陈永妍，竟非中国一代体操明星，几乎全部去了美国。这样整齐的队伍，简直可以重组体操团体赛阵容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象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在吸引着中国运动员，黄金海岸在向他们招手，他们也把投奔那里，作为自己结束运动生涯后的最佳选择。中国太穷了，许多运动员在留洋之前，甚至连顾盼故乡的一缕情丝都未牵起，就毫不犹豫地飞走了。

一面是站在冠军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心中荡漾着民族自豪感；

一面是迎着五光十色的物质诱惑，内心深处滚动着强烈

的自悲。

这就是中国运动员最先品尝到的痛苦。

游泳运动员钱红，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得到2000元的奖金，她连数都未数，就全部交给了母亲。她仍然只从母亲手里接过她每周一元的零花钱，夏天买冰糕，冬天买牛皮豆吃。母亲薪水微薄，钱红以为，能给她一块钱买零食，已经是自己最大的奢侈了。

今天的游泳运动员杨文意，在汉城奥运会上获得银牌后，用2000美元为自己在香港购置最好的激光唱盘，最大的音箱，最新颖的录音设备，组合成最昂贵的组合音响。她在夺取奖牌的同时，也不免学会了花钱。

马文广，一个黄河故道的子孙，当年能举起沉重的杠铃，连破亚洲纪录，可在家乡父老亲人面前，他却抬不起那沉重的头颅。那年，他闯荡了10多个国家凯旋故里，母亲依在门边迎他。旧桌上，摆出冒尖的一碗混合面擀的面条，一双筷子插在面条里，素炒的新鲜蔬菜冒着热气，这是家乡人过节时才吃的饭食。在家期间，母亲每天都用这来款待他。可他吃不下去，泪水禁不住往下流，弟妹们都躲出去吃地瓜干呢！父亲见儿子捧着碗落泪，便拉他去看粮仓。当他亲眼看到圆滚滚的粮囤，装得满满当当的小麦口袋，才止住了泪。哪曾想，这全是假的，麦子是从邻居家借来的，圆滚滚一囤地瓜干底下，是父亲事先垫的破棉花套和干草。家里连地瓜干都吃不饱，父亲怕马文广心疼，影响事业，在马文广归家之前，弄了这么一个饱满的假粮囤。直到马文广探家回队，还被蒙在鼓里。

这以后，马文广不再每年都回家了。尽管他一闭上眼，家乡那高出地面的黄河故道，那亲切而贫瘠的多沙土地，那

挺立着的树木和匍伏着的地瓜蔓，就会出现在面前。父母兄妹和乡亲的面孔，几番梦中萦绕，他还是狠了狠心，告诉自己：不能回去。他含泪发誓，要拿金牌，要混出息，要让母亲不再终年吃地瓜干，要让弟妹不再挨饿，要让家里的粮囤真正饱满。只有到那一天，才有脸重返家园。

而今的世界冠军何灼强，每挺起一次世界纪录，每打破一次全国纪录和亚洲纪录，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币滚进怀中。1987年全运会，他的各种各样的奖金加在一起，达几万元。恐怕，何灼强怎么也无法理解马文广的心酸。

从洛杉矶奥运会到汉城奥运会，短短的四年时光，许多运动员从身无几文，到成为几万几十万的富翁。连他们自己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金钱的洪水淹没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对金牌获得者的奖金是6000元。国家第一次不单纯用荣誉来鼓励，还给予物质奖励。汉城奥运会金牌的奖金是15000元，后来又决定再增加一些。另外加上香港商人、企业的馈赠、地方省市的奖励，一块金牌少说也是五、六万。怪不得女排里有人说，汉城奥运会一块铜牌所得，超过中国女排前五次获金牌奖金总数。

一夜之间，艰苦创业、拼搏进取，旧式的传统教育似乎显得苍白无力了。运动员不再比较黄土高坡上的父老乡亲，不再敬佩节衣缩食抚育自己的母亲。他们与出国去留学的同伴比，他们与外国运动员的收入比，金钱这东西，有谁会嫌多呢？

李宁，昔日洛杉矶奥运会的体操王子，沦为今日汉城奥运会体操比赛的“天涯沦落人”。知情的人心痛地说，是健力宝害了他！这样讲未免有些过份。我们也绝对相信“健力宝”无害人之心。但李宁与“健力宝”的深厚关系，却是显

而易见的。几年前，李宁的母亲患重病来北京求医。做手术、养病、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都由李宁开销。据李宁讲，那时他每月的花销高达3000元。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后台做支柱，他一个运动员怎么担负得起？也就是从那时起，“健力宝”给予李宁巨大的帮助。一方，是中国著名饮料厂家；另一方，是中国著名运动员。这两者在中国商品经济大变革和体育事业大变革的时刻碰撞到一起，是自然而然的。遗憾的是，做买卖这东西也是有瘾的，大量的精力投入拉关系、做广告、办活动中去，势必要耽误训练，李宁从体操王子沦为败将，当然也是自然而然的。

乒乓球队里工资收入最高的，要算江加良、陈龙灿了。而他们的月薪，不如曹燕华在日本受聘一天所得酬劳的零头。即使世界锦标赛得到外国的奖金，也要大头上交国家。怪不得江加良拿到奖金时，把大把的美元拍得“嘎嘎”响，一脸的自嘲。

我们的国家太穷了。尽管国家拿出越来越多的钱奖励优秀运动员，还是挡不住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退役后出国留洋。也许下届奥运会金牌的奖金还会更高。然而，这能再刺激中国运动员去重新振奋旧有的精神吗？

在汉成，庄泳身穿便服走出奥运村，带着夺得银牌实现游泳零的突破后的轻松，走在大街上。两边是琳琅满目的货摊，冒牌的名优服装，怪模怪样的布娃娃，包装精美的小吃食，五光十色的纪念章、钥匙链。要是让没有比赛完的运动员知道，她光顾此地，非羡慕死不可。奇怪，这些对姑娘极有诱惑力的东西，却诱惑不住庄泳。她此时，一脸虔诚地步入教堂，在唱诗班舒缓的歌声中，蹲了下去，头上，就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我爱上帝”。16岁的庄泳对神父说。

“上帝也爱你，我的孩子。”

神父捧着一套汉文版的《圣经》送给了庄泳。于是，在庄泳床头，又多了一种新版本的圣经。读《圣经》已经是16岁的小姑娘睡前的必修课。虽然她有些地方还读不懂，时常要去请教她的教练周明。但是，她仍然虔诚地信奉着上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与众寡台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

她能随口背出许多《圣经》上的警句。翻开她训练日记的扉页，几乎抄录的，都是《圣经》上这样的句子。当记者不解地问她：“你不信仰共产主义吗？”谁知这位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少女，反瞪大眼睛惊讶地问：

“这年头还有信那个的？！”

庄泳的教练周明是共产党员，他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学生信仰共产主义，还不得不耐心地回答学生请教《圣经》中的问题。

中国女篮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一枚铜牌，之后却一输再输，直至汉城奥运会落到第6名。换过两任教练都弄不明白其中原委，而郑海霞一句话就定论了“赛前忘了烧炷香，菩萨没保佑，哪能有好运气？”这绝不只是玩笑话。为数不少的运动员的桌子上，都能找到大肚弥勒佛和观音菩萨。娄云认定：每次比赛鞍马朝东就跳得好，鞍马朝西就非得跳砸锅。赛前甭管教练怎么做工作，他只认这个。

许多运动员也不避讳地说：“我们运动员都很迷信。”

当然也有什么都不信的。

陈龙灿出国比赛总要将一本袖珍影集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那是他女朋友的照片集锦。一位文静秀丽的小姑娘，看到她甜甜的微笑，陈龙灿打球才来情绪。为了配得上她，他得打出点男子汉的威风来。他常自豪地拍拍兜向别人炫耀：

“这是我打球的原动力。”

在中国男篮的“和尚”队里，可没有陈龙灿那么温柔缠绵。奥运会前，练得苦，累了便扯开嗓子吼：“拿起笔来做刀枪……”宋涛去了趟美国，唐人街上买来一盘《文革十年歌曲集锦》，没事就放这盘磁带，声音蛮大，不多久，就在队里风传开来。据说市面上，文革的歌曲目前也很走俏。在歌坛上强劲的西北风尚未刮过之时，又套进红卫兵的：“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你想会是什么滋味？怪不得每次放磁带，或有人在走廊怪里怪气地学上一句，都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既或夹上一句笑骂：“大傻冒”！

有的教练不解地问：“怎么爱听这种歌，这好听吗？”

得到的回答却极轻松：“好玩呗！”

十年的人生苦难，多少教练付出他们最宝贵的青春，而今天的年青人仅用一句“好玩”就轻描淡写地抹过了。

一个多么可怕的空洞呀！50年代，中国体育靠革命干劲来激励运动员；60年代，靠为人民服务的牺牲精神；跨过70年代的断层，象五六十年代的回光返照，女排的拼搏精神仍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然而，这种回光返照毕竟太短暂、太无力了。

而今的运动员，落入彷徨，落入迷惘，落入信仰的危机！

“5·19”足球事件之后，袁伟民曾冒着被国人骂臭的危